

蒂姆·尼布洛克教授论中东热点问题

龚 鑫*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发酵，域外大国与区域大国围绕叙利亚问题的角力再次升级。“伊斯兰国”导致冲突的各个行为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叠加关系，并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以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家建设失败为代价，库尔德人成为中东重要的政治力量。中东难民问题对欧洲造成了较大压力，难民问题和恐怖行为相互交织，对传统的安全观构成了严峻挑战。中东政治秩序的动荡和重构引起国际社会包括一些学界人士的关注，也引起了中国学界和政府的重视。2015年10月至11月，欧洲中东学会副会长、英国中东学会副会长、英国区域研究协会副主席、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政治系教授兼“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蒂姆·尼布洛克（Timothy Niblock）再次莅临陕西师范大学讲学。蒂姆·尼布洛克教授早期主要从事北非与东非研究，其后转向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主要从事中东海湾与亚洲关系研究。借此，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秉忠副教授就中东热点问题专访了这位国际知名中东问题专家——蒂姆·尼布洛克（下文简称“蒂姆”）。对于中东地区在2015年底、2016年初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李秉忠副教授又通过电子邮件持续进行了跟踪采访。以下访谈或笔谈要点仅代表他个人的学术观点。

中东文明史与当下地区动荡

李秉忠：蒂姆先生，您好！您是中东问题专家，很高兴能够有机会邀请您就中东问题进行对话。众所周知，中东地区矛盾丛生，冲突频发。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诸多学者认为，中东也是众多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您

* 本文整理者龚鑫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人认为世界最早的文明起源于中东。作为世界众多文明起源地之一的中东，何以充满冲突，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蒂姆：在我看来，中东地区现在确实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但事实上，如果回顾过去 500 年历史，其他地区的矛盾冲突可能更多，欧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各地在 30 年战争期间，曾发生过十分惨烈的冲突。中东曾经有过璀璨的文明，世界最早的文字就在这一地区产生，特别是今天伊拉克南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等。中东古代文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模式，自然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冲突。中国文明也历史悠久，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也曾经历过各种冲突。处于快速转变中的政治驱动力是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但冲突并不是全部的历史，我们需要理解中东文明的本质。如埃及当下的冲突色彩较为浓厚，但与此同时埃及有着古老的文明，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埃及文明的重要特征，埃及人也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除文明因素外，我认为还需强调巴以冲突和石油经济对中东国家的影响。巴以冲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东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走向，巴以冲突的存在使得诸多阿拉伯国家在财政支出上牺牲了民生方面的投资，而转向购买武器。石油经济则给中东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国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域外大国出于对石油资源的需求，需要确保海湾地区的稳定，然而它们对各国政体的性质并不特别关注。就此而言，巴以冲突和石油经济改变了整个区域诸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态，也使得它们容易受到外部势力和全球政治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深谙巴以冲突和石油政治经济，就无法准确理解中东政治。

李秉忠：我很赞成您的观点。当中东地区的人民知道 500 年前欧洲也曾经历动荡不堪的历史，可能就会多少理解自己当下的处境。把当前的中东形势与该地区曾经璀璨的文明相结合，有助于我们从历史长河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地区的当前问题，也使得我们有理由对中东未来充满希望。审视历史，关注现实。近 5 年来，中东地区充满着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始自 2010 年底被一些学者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变局，似乎现在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许多学者对该问题的判断出现了较大偏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蒂姆：事实上，中东地区的发展形势确实超乎许多人的预料，您把目前

阿拉伯的形势称为“阿拉伯之冬”是很有道理的。当我们现在环顾中东时，会发现在 2011 年至 2012 年“中东起义浪潮”^①中，只有突尼斯暂时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体。该地区发生动荡的其他国家政治形势不容乐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相同的模式。倘若要了解为什么中东局势与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预期的走向不同，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明晰他们本来的预期是什么？西方政界和学者原本对于中东局势的走向有自己的预设。他们以为中东地区会经历东欧地区的那种变化，即通过选举方式来产生议会，建立“民主政府”，最终实现稳定与繁荣。事实上，这种想法毫无道理。中东地区没有理由按照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或乌克兰的模式发展，这是因为阿拉伯世界有其不同的历史，有其自身的问题，其内部的种种分歧有其独特性与复杂性。我们应该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部的阿拉伯世界（不包括埃及）建立现代国家的原初条件和过程，它们虽都属于古文明区域，但同时也都是新生国家。这些国家没有自然的建国历史，完全是按照外部势力——主要是英国和法国——设定的政治架构来进行的。这些区域原本并不在英国和法国的管辖范围内，英、法两国现在所追求的是控制这些区域，对这些新生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并不重视，它们关注的只是自身的利益，忽视了族群构成、宗教属性以及边界安全等重要因素。这些国家具有的“人造性”使得它们隐藏着一些与生俱来的问题。由此，阿拉伯世界民众受电视台播放突尼斯卖菜小贩自焚事件的刺激，感到冲突国家的各种情况和场景与自己的经历非常类似，动荡以此传播开来。

伊拉克战争与“伊斯兰国”

李秉忠：现代媒体在革命动员中的作用确实需要充分的评估。在“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之冬”中，已经有很多因素作用于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近来又出现了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新因素，许多来自外部世界的年轻人，都被吸引并加入该组织，对此我们该作何理解？

蒂姆：“伊斯兰国”的出现看似突然，但事实上早有端倪且有历史根源。

^① 关于 2010 年底肇始于突尼斯的中东变局的性质研判，国际和国内学界存在巨大争议，有多种说法，包括“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起义”或“阿拉伯暴动”、“阿拉伯革命”、“阿拉伯政治危机”、“阿拉伯社会运动”。蒂姆这里倾向于“阿拉伯起义”说。

加入“伊斯兰国”的成员过去都曾积极参与到各种斗争中，如参加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活动，一些人曾在阿富汗参战，许多人曾经参与过反抗英、美在2003年后占领伊拉克的斗争。当下，许多人关注“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存在，但“伊斯兰国”最早出现在伊拉克，然后从伊拉克转到了叙利亚，它在伊拉克的存在更为重要。“伊斯兰国”最早的活动基地位于伊拉克的逊尼派所在地，目前它的支持力量也主要来源于伊斯兰逊尼派，其问题的根源还在于2003年之后伊拉克政体安排所导致的逊尼派力量的不满情绪。逊尼派阿拉伯人认为，伊拉克已经落入到美国和占据伊拉克多数领土的伊斯兰什叶派信徒手中，信奉逊尼派的伊拉克人则处于被排挤且得不到尊重的境地。更重要的是，2003年美军解除了伊拉克军队的武装，因为原萨达姆军队的领导层主要由信奉逊尼派的人员构成，这些军队高层主要来自于现由“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地区，他们转而投向“伊斯兰国”。因此，我们目前可以清楚地知道“伊斯兰国”出现的原因，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源于外部的、毫无预兆的出现，而是由于其内部民众——如摩苏尔地区人民——的支持而出现的。在“伊斯兰国”接管这一地区前，逊尼派的抵抗活动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先在伊拉克建立了活动基地，后转移至叙利亚，“伊斯兰国”所谓的首都拉卡就位于叙利亚境内，但其领导者主要来自于伊拉克而不是叙利亚。因此，“伊斯兰国”的活动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在与伊拉克军队的冲突以及与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者的冲突中，“伊斯兰国”获得很多好处。就外部支持而言，有许多个体为“伊斯兰国”提供资金支持，但“伊斯兰国”目前所使用的主要是美式武器，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地区。美军曾为伊拉克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当伊拉克军队在与“伊斯兰国”的交战中溃逃后，留下了大量武器，如坦克、大炮等等，因此，“伊斯兰国”的武器主要来自于与伊拉克军队及叙利亚的这些反对派的支持者们冲突后的战利品。这些武器是“伊斯兰国”目前能够开展武装活动的重要原因。

李秉忠：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伊斯兰国”的崛起与伊拉克战争，甚至与之前1990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尽管战争当时仅仅影响到伊拉克人，但其更广泛且深刻的影响现在正在凸显。

蒂姆：确如您所言，中东地区的现状与1990~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有着密切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影响是从海湾战争后开始的。1991年，伊拉克被迫已从占领的科威特撤出，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只在伊拉克边境地

区作战，并未进入伊拉克境内，并成功把科威特交还给该国的统治家族。但在 1991 ~ 2003 年的 12 年间，伊拉克遭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严厉制裁，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贸易直接受制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规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伊拉克的贸易进行了严格的管控。起初，这些制裁的目的在于迫使伊拉克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伊拉克自 1996 年以后就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些武器，但美国仍坚持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要求对伊拉克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直到萨达姆·侯赛因改变其政策。这种做法对于伊拉克人民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当然，西方国家在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中，也允许该国有一定数量的商品进口，如食品、药品等，但其他商品则严格受限。伊拉克民众经受了极端的困苦，而国家却无能为力。在此期间，伊拉克的各个民间组织开展了一些有效的活动，很好地利用了有限的资源。例如，它们修复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被摧毁的供电系统。更久远的影响在于，普通民众无法依靠政府，只能依靠各种部落或者宗教组织，从自己的教派或者族裔中寻求安全和庇护。许多伊拉克人丧失了国家归属感，对他们而言，教派和族裔归属——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就显得更为重要，因而在伊拉克人中形成了一种高度分裂的社会现象，出现了教派和族裔的碎片化。2003 年造成巨大灾难的伊拉克战争，使伊拉克军队遭受重创，军队中出现了去复兴党化现象，行政机构中但凡与 2003 年之前的复兴党有关的人都被清理。2003 年的这种情况加深了伊拉克人民的这种民族分裂感，人们更渴望归属于某一个前现代的部落或是教派团体，而不是认同于国家。在我看来，若要理解伊拉克当前的局势，我们就必须要思考过去时段战争情势对伊拉克的摧毁以及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的深远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逊尼派力量感到自己受到排挤，他们开始寻求更多的逊尼派人的帮助，“伊斯兰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萨达姆与伊拉克的悲剧

李秉忠：美国号称将在伊拉克构建新型的民族国家，最终导致的却是伊拉克国家的失败和生灵涂炭，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已向伊拉克人民道歉，我们也期待着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也能够向伊拉克人民道歉。

蒂姆：我也希望如此。但这种道歉有时看来也没有必要，于事无补。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本来可以有上佳的选择，即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可以对伊拉克采取不同的政策，保存伊拉克军队的实力，把资源用于修复当地的基础设施，用于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人，但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当时，美国的确为伊拉克提供了一定的援助，但由于伊拉克政府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因此伊拉克虽有大量资金流入，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资金，但这些钱并未用于各项基础性工程的建设，也没有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大量资金被政客转移出境，存入境外银行。

李秉忠：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本该采取其他措施，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美国时代的伊拉克留下了太多的问题。另外，据我所知，您见过萨达姆本人，您对他的印象如何？今天我们该如何公正评价萨达姆呢？

蒂姆：萨达姆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十分关注世界的发展变化。他的出身并不显赫，但他把自己置于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地，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有时获取的信息不一定准确，这是因为他周围的人没有告诉他真相。在我跟他会面的那一次，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时我在巴格达参加一个政治学会议，突然被告知将与萨达姆会面，我是前往萨达姆官邸代表团中唯一一个非阿拉伯人。这次会面的经历让我明白，人们为什么通常情况下不会告诉他真相。因为我发现，在与他会面之前和真正见到他时的经历让访客已经自感十分渺小且不愿对他讲真话。在我们与他见面之前，我们这些人讨论了见面时打算要对他讲些什么，特别是对他提些什么建议之类的，以及如何提建议。当我们进入伊拉克共和国的宫殿时，我们从外边的坦克旁经过。进入宫殿后，我们全身接受了严格搜查。

李秉忠：这或许是萨达姆对自己和政权不自信的表现。

蒂姆：我同意您的说法。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好笑，我们必须掏出兜里的东西，装进一个布袋子里，出来时可以取走。我们的皮带都得解下来，以防它们成为攻击总统的武器，鞋子被放入特殊的机器中。在这之后，我们经过一个很长的走廊，最终来到他办公室的书房，这时的我们已经感觉到非常疲惫、虚弱。我们在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他与我们一一打招呼。萨达姆本人身材魁梧，比电视上看上去还要高大些。他坐在那里，手放在身边，别人要想同他握手就必须把手伸长，就像是向他鞠躬一样，握手时摄影师会对着总统拍照，这些照片后来让人看着都极不舒服。接着，他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房

间，他跟我们说话时全神贯注，讲的是阿拉伯语，他讲了大约有三四十分钟（用阿拉伯语），他主要是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认为两伊战争的始作俑者是伊朗而不是伊拉克。然后，他突然打住转而问我们：“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中没有人能够说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来，我们原本要给他提出建议或意见的想法早就烟消云散了。我知道其他前去见他的人，包括外国驻伊拉克大使，甚至是他自己的部长们也会遭遇同样的经历，会有相同的感受，那就是当真正见到他本人时，他们不敢畅所欲言。我想萨达姆是真的想听真话，但是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比如说他身穿军装，旁边放着手枪，都使事情适得其反。所以，萨达姆往往无法准确评估局势，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都是其误判造成的恶果。2003 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也同样，也许他无可奈何，当时的决定权在华盛顿，萨达姆政权就此被摧毁。

李秉忠：萨达姆很有趣，他总是让别人在他面前感到自身的虚弱渺小，但这对伊拉克人民来说是非常糟糕的，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蒂姆：这对伊拉克人民来说是悲剧性的。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多次前往伊拉克。伊拉克发展良好，本来如果政策无误，就可以有更光明的发展前景。伊拉克土地肥沃，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丰富，丰富的水资源非常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伊拉克富产石油，该国人民生产技术和教育水平都较高。现在，很多伊拉克人背井离乡，都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尽管这样，只要国内政治局势稳定，许多伊拉克人还是愿意回到伊拉克生活和工作。许多人认为，伊拉克本可以发展成一个和谐的现代国家，但是由于萨达姆的错误决策和外部势力的介入，这一切化为乌有。

李秉忠：从伊拉克到中东其他国家，普通民众经历了太多的地区动荡之苦。我知道您曾经多次去过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民在经历了多次冲突和战争后，特别是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后，如何看待自己的当下处境与未来？

蒂姆：当看到当地人所经历的一切时，我的心情极为沉重。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叙利亚人冒着生命危险离开自己的祖国，成为投靠欧洲的难民，形成近期的中东难民潮。不仅叙利亚如此，埃及人的处境也很糟。苏丹虽说遭遇的事情不同，但人民也处境堪忧，利比亚情况与叙利亚相似。这些国家的突出共同点是，在经历内乱后无法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政权，无法实行统一合理的政策。有些国家石油资源丰富，人民生活本该富裕，但实际上却处于贫困状态。我们必须理解这些国家的人们在历经苦难之后的悲苦心情，而我

认为从长期视角看，这对这些地区政局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目前还很难说到底这种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我看来，结果并不乐观。人们会从中吸取教训，采取不同行动，而性别差异、敌对情绪、分裂之感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和选择。然而，我认为像在沙特这样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人们也对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事情感到心痛，这些遭受不幸的国家都曾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当人们每天在电视上看到其文明被摧毁，自古流传至今的纪念碑、城市古建筑、古遗址被毁，那种痛苦的心情不仅仅是被直接经历苦难的人所感受到，而且也是为所有向往辉煌繁荣的人所痛心。

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

李秉忠：2015年1月2日，沙特处死了该国知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由此点燃了沙特和伊朗的外交战，并对中东乃至全球伊斯兰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沙特、巴林和苏丹已宣布与伊朗断交。在您看来，这是否代表逊尼派主导的沙特与什叶派主导的伊朗之间教派差异的表现？沙特为何会有如此过激的反应？两国双边关系乃至区域局势未来走向如何？域外大国可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蒂姆：尽管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伊朗是一个以什叶派为主体的国家，但在历史上海湾地区是一个逊尼派和什叶派和平相处的地区，因此不能将伊朗和沙特关系时下的迅速恶化归因于双方历史而形成的诸多差异。现在的问题更多地来源于区域政治。与沙特相比，伊朗面积更大、人口更多，这就导致沙特感到自身似乎易受攻击，这一忧虑缘于伊朗推崇迥异于沙特的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而被放大。一直以来，沙特因是圣地所在地而自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认为伊朗推崇不同的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威胁到沙特的地位。沙特政府在过去36年中（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基本判断是，它可以通过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及借力于域外大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来遏制来自伊朗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沙特若能够持续对东阿拉伯世界施加影响（有时候是一种控制），能够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它就可以降低与伊朗冲突的风险，也可以避免与伊朗的直接对抗。

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沙特现在面临着一个不再敌视伊朗的伊拉克（事实上，巴格达与德黑兰的关系好于巴格达与利雅得的关系）；在应对叙利亚冲突中，形成了巴沙尔政权、真主党、伊朗支持的势力与沙特所支持

势力之间的对抗，而沙特之前的“庇护伞”美国试图怀柔伊朗，以图实现区域安全。亲伊朗的力量也控制了也门相当一部分领土，而也门与沙特有着相当长的共享边境线。当然，这一问题也与当前沙特国内因素有关：石油价格一路下滑对沙特经济构成了新的挑战；由于区域格局的发展变化沙特国内的什叶派人口变得越来越坚定而自信；沙特王室内部也出现了诸多分歧。

在安全和政治地位方面面临的巨大变化往往使当政者通过对自身力量可及范围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以此证明自身依然强大且能够对他方构成威胁。在我看来，沙特当局处决尼米尔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沙特对于驻德黑兰大使馆遇袭之后的强烈反应。短期来看，沙特政府证明它依然可以对地区局势产生较大影响，如巴林和苏丹与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其他一些国家也与伊朗降低了外交关系等级，但从长远来看，这并非是一个明智之举。伊朗业已建立的强大的区域地位不会由于沙特的举动而明显受挫，除非是伊核谈判成果落败，伊朗因此重新陷入一种被孤立的状态，或者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亲伊朗的力量被消除。就目前而言，上述两种情况都无可能性。对于沙特而言，它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认识到区域变化中的新平衡，与伊朗共同探求一种双方可以共存的新型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最终还是需要海湾国家集体安全的框架下存在——海湾国家可以在这样一种框架中处理内部的争端并达成和解，而沙特最近的举动导致这一进程极其困难。域外大国可以在鼓励双方摆脱对抗，促进双方和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俄罗斯、伊朗与叙利亚内战

李秉忠：我还想请您简要评论一下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具有多重考量因素，在时机的选择上也非常讲究，希望通过打击“伊斯兰国”巩固自身在中东的战略支点地位，同时又使得西方国家无法反对。

蒂姆：俄罗斯和伊朗关于叙利亚局势判断的准确性，往往超过了西方国家。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有考虑恐怖主义向自身领土蔓延的担忧，但俄罗斯此次行动中有复杂的地缘政治考量。事实上，俄罗斯对叙利亚最初几天空袭的对象并不主要是“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更多的是针对巴沙尔政权的反政府力量。俄罗斯实质上是在利用西方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为其支持巴沙尔政权寻求合法性，进而为其提供强大的军事支持。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有苦

难言，无法对俄罗斯打击反政府武装进行指责，因为它们也在以军事的方式干涉叙利亚事务。就此而言，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略选择达到了预期的外交和战略目标，此举非常睿智。然而，从长期来看，俄罗斯面临着所有武装干涉叙利亚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果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俄罗斯将如何从叙利亚安全脱身。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局势很有可能持续恶化，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一直强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的原因。

李秉忠：您认为俄罗斯和伊朗是否将在某种程度上从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中获利呢？

蒂姆：目前的情况的确让它们得到了好处，但未来的局势还需关注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我认为，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局势是其重返中东的政治博弈的标志。伊朗成功巩固了与伊拉克伊斯兰什叶派政府的广泛联盟，这不仅使黎巴嫩成为伊朗联盟的一部分，而且还强化了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联盟关系。这种举动体现了伊朗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及重要地位，这一点已为其近期达成的伊核全面协议所证明；更重要的是，伊朗在这一地区加强了联盟，从而更好地确立了自身的地区大国地位。因此，我认为俄罗斯和伊朗还是从中受益匪浅的。未来情况会怎样发展，则取决于它们能否为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如果俄罗斯和伊朗能帮助有关各方就叙利亚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它们的影响和行动力也会清楚地展现出来。近来的相关谈判表明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李秉忠：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有意为之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极具风险。在我看来，土耳其此次外交冒险具有以小国绑架大国的意愿，即通过击落俄国飞机，迫使美国做出选择；而在土耳其看来，美国及西方无疑会选择支持土耳其。您如何看待上述情况？

蒂姆：我无法相信土耳其袭击俄罗斯战机属于事先未加筹划的行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强调5分钟之内土耳其多次向俄罗斯战机发出警告，但事实上俄罗斯飞机只是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越过了土耳其一小片领土。因此，这极有可能是土耳其政府有意的行为，既是向俄罗斯发出强烈的信号，又是希望获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土耳其确实需要在叙利亚危机的背景下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西方指责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行为主要是遏制库尔德人运动，尤其是与库尔德工人党相关的行为，并非是在打击伊斯兰国。在土耳

其与“伊斯兰国”共享的边境地带，土耳其没有严加看管，因而“伊斯兰国”利用这一空隙寻找补给和贩卖石油。由此看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的行为很可能是为了在西方获得支持而有意为之。

中国、英国与中东局势走向

李秉忠：我们注意到英国议会最近做出了空袭叙利亚的决定，这一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会作用于“伊斯兰国”以及叙利亚局势的走向？

蒂姆：我不认为英国决定空袭叙利亚“伊斯兰国”的设施将会摧垮“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伊拉克逊尼派控制的地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逊尼派地区有着天然的支持力量，它所获得的支持远远大于叙利亚。摧毁伊拉克“伊斯兰国”力量的困难在于很难将武装分子与普通的逊尼派穆斯林居住区分开来，而任何对于无辜的逊尼派民众的袭击，最终都会导致民众更多的不满。逊尼派穆斯林民众的不满情绪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已经得以累积，而且，现在“伊斯兰国”在利比亚、阿富汗已经建立了新的生存基地，因此叙利亚局势对它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打击“伊斯兰国”需要地面部队的有效支持，但即使是地面部队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类似的战术在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也不一定奏效，因为“伊斯兰国”与当地民众混杂在一起。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正在上演的冲突都需要通过政治的方式加以解决，冲突各方都应该参与到谈判的解决方案之中，都应当为解决冲突贡献力量。

关于中东冲突的解决和未来，我认为以下 5 个方面尤其重要。第一，冲突的解决需要冲突各方的介入，叙利亚危机的解决舍此别无他法。第二，中东需要逐步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体系，区域各国有责任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从而摆脱外部大国对区域安全的干预。第三，国际社会要支持拥有广泛政治基础的政权，保证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第四，尽力减少外部的军事干涉，历史证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只会导致局势更趋恶化，它所带来的问题远远多于可以解决的问题。第五，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寻求一项现实公平的解决方案，要像对以色列人一样，对于巴勒斯坦人同样多地考虑他们的利益、安全和他们的关切。

李秉忠：虽然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仍不稳定，但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

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中东地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您认为中国在中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和机遇？

蒂姆：我认为在中东，中国所幸并未犯下西方国家的类似错误。事实上，西方国家在过去的20多年中对中东的每一次军事介入，尤其是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给予叙利亚军事组织提供的各类援助，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有时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并未正确认识到自己在当中所起到的破坏性作用。幸运的是，中国并未走上这样的错误道路，中国未来也并不打算这样做，在我看来这很好。我认为中国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中东事务，从而使中国和中东国家双方都能受益。也就是说，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已经与海湾地区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以及伊朗、伊拉克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情况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中国就此拥有了特定的机遇，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中国可以努力促使冲突各方做出妥协和达成和解，特别是沙特和伊朗两国之间。伊朗和沙特之间的敌意和敌对关系是海湾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也是可能导致外部势力介入海湾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长期的不稳定局势势必会对中国和其他各国产生不利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陆上部分比起海上部分更为艰难。把海湾地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做符合海湾各国的利益，例如铺设输油管道和建设铁路，从海湾到伊朗再到中亚铺设石油管道，这就需要沙特和伊朗建立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关系，这对所有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极有益处。海湾国家通过“一带一路”与中国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可以借此与其他丝路沿线国家建立联系。当然，在此过程中，中国要让海湾国家得到一些“奖励”，至少是可以看到一些潜在的收益。沙特和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都将从“一带一路”中获益良多，它们或许愿意为解决争端做出妥协，这就是“一带一路”真正的作用和价值所在。就海湾地区而言，目前还很难想象局势的发展方向，但如果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一切皆有可能。

李秉忠：我想“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在中东地区势必会遇到一些风险，但我认为中国政府愿意和当地人民一道共同努力为人民创造福祉。非常感谢您！

蒂姆：谢谢！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冯基华）